

非洲伊斯兰教传播的阶段和伊斯兰文化地带

斯番塞·崔明翰 (J.Spencer.TRIMINGHAM) ① 李维建 译

一、伊斯兰教的传播

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可明显划分为四个阶段，而这四个阶段也分别与传播的方式、传播深度和非洲当代伊斯兰教相应。

(一) 占领北非 (638—1050)

第一阶段，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了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地区；接着，在短暂的和平之后，迅速兴起的诸伊斯兰国家，打破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治统一局面。伊斯兰教逐渐被柏柏尔人所接受，但是他们的阿拉伯化却延续到下一个传播阶段，是随着新来的阿拉伯游牧者的到来而发生的。

(二) 伊斯兰教向苏丹^②地带传播 (1050—1750)

这一阶段，伊斯兰教缓慢地，而且主要以和平的方式，向南越过撒哈拉沙漠，或者沿尼罗河谷溯流而上，传播到苏丹地带的含米特人居住区和黑非洲。伊斯兰教越过红海，或者沿着东非的海上航线，传播到东非之角原地带的阿法尔人 (Afar) 和索马里

① 斯番塞·崔明翰 (1904—?)，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非洲伊斯兰教研究专家之一。本文是作者的一个学术篇论文，主要论述非洲伊斯兰教的发展阶段和区域分布，这篇论文的观点一直影响到当前的非洲伊斯兰教研究。选自路易斯主编的《热带非洲的伊斯兰教》(I. M. Lewis ed., *Islam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hases of Islamic Expansion and Islamic Culture Zones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② 苏丹，亦称苏丹地区或苏丹地带，是指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自西非，经中非，延伸到东非的东西狭长区域。其南缘通常以热带雨林为界。“苏丹”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比拉德苏丹 (bilād as-sūdān)”，意为“黑人的土地”。苏丹地区自西向东依次分为西苏丹、中苏丹和东苏丹 (尼罗河苏丹) 三个次区域。现在的苏丹共和国和南苏丹共和国，只是尼罗河苏丹的一部分，这两个国家的名称是对“苏丹”一词的继承和延续，表现出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历史联系。——译者注。



人中间。穆斯林沿着东非海岸建立定居点，于是一个新的文化集团——斯瓦希里人——形成了。但是，伊斯兰教并未对这里的班图人和其他族群产生影响。

这一阶段，以柏柏人中的穆拉比特人兴起（自 1056 年始）和游牧的班努希拉勒阿拉伯人（Banu Hilal）向北非渗透（自 1045 年始）为起点。这两个历史事件主要影响沙漠地区和北非地中海沿岸。尽管穆拉比特人征服了沙漠南缘的黑人国家加纳，却很快被击退了。阿拉伯部落不传播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征服了穆拉比特柏柏尔人、摩洛哥南部，并导致了这里的伊斯兰化。撒哈拉沙漠深处的柏柏尔人，即图阿雷格人，既未被穆斯林征服，也未阿拉伯化。

伊斯兰教越过撒哈拉传播到苏丹地带北部，西苏丹和东苏丹的传播途径是不一样的。西非是由柏柏尔商人和宗教人士完成，东苏丹则通过阿拉伯部落的迁入（1300 年—1500 年）完成，尼罗河苏丹的部分基督教族群也随之消失。

伊斯兰教作为阶级的宗教，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苏丹地带的国家中，如马里帝国和加奈姆帝国，伊斯兰教只能作为皇室信仰，或者作为商人阶层和穆斯林宗教阶层的宗教。在苏丹地带，各种的宗教并行不悖，多种宗教阶层同时存在，因此，伊斯兰教的到来，虽然看起来有些陌生，却并未让当地人感觉到它与非洲本土宗教的观念不能相容，而是被纳入到苏丹的宗教框架中。苏丹地区的宗教生活展现出大融合的特点，或者更准确地说，原有宗教和新宗教并存的二元主义或平行主义——非洲本土社会和谐的思想抑制了伊斯兰教的独一观念。因此，伊斯兰教中对当地传统生活具有挑战性的元素很大程度上被中和了。

在下一个阶段，伊斯兰教以声称其具有独一性的方式，在苏丹地带大获全胜。同时，在现代时期，我们可以在新皈依者中窥见与传统非洲伊斯兰教相异的世俗伊斯兰教的倾向。

（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神权政治和神权国家时期（1750—1901）

19 世纪的特点在于，一种新生的、持非容忍态度的军事伊斯兰教的出现。伊斯兰宗教人士以发动“吉哈德”或“圣战”的领导者出现（首先出现在 1725 年的富塔贾隆^①），他们建立了一些通常被称做“神权政治”的国家。其实这些国家应被称为“神圣的法治国家”，因为它们都宣称受神圣的法律的统治。在苏丹地带，这些国家从几内亚（富塔

^① 现在西非的几内亚中西部地区。——译者注。

贾隆, 1776 年) 和塞内加尔 (富塔托罗, 1776 年), 经马西纳 (1818 年) 和索克托 (1802 年), 直到尼罗河苏丹的马赫迪国家 (1881 年), 相继出现。不久, 这些国家日渐衰弱, 大多数被征服, 或者被置于一种新型的极权统治之下, 如西苏丹的哈吉·乌马尔 (1854—1864) 和尼罗河苏丹的阿卜杜拉·塔艾什 (‘Abdallah al-Ta’aishi) (1885—1898)。

19 世纪的改革者们所引入的巨变, 强调伊斯兰教的独一性和对非洲古老宗教的排斥性。原先的伊斯兰教不具挑战性, 它的非洲化非常彻底, 以至于几乎丧失了它的伊斯兰身份。这些改革者在非洲原来不具挑战性的伊斯兰教中制造了紧张, 推动伊斯兰教作为转变的因素进入非洲人生活的中心。社会的平衡也因此被打破了。尽管在他们的继任者中, 这种排斥性有所减弱, 并且生活中事实上存在着对异教徒实践的众多融纳, 不过原来的变革足以推动伊斯兰教继续向前, 作为生活的最高仲裁者和主导因素而存在。

改革者的征服运动, 导致大范围名义上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①, 但是他们的最大贡献在于, 通过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摧毁传统的部落集团 (罪犯、奴隶村庄、强迫迁居等), 破坏本土宗教的组织, 使伊斯兰教作为新组织或组织重构中的唯一粘合剂。在下一个阶段, 欧洲人占领了这些地区, 这种过程则加速发展。

(四) 从殖民时期到现在

上个阶段的后期, 也是欧洲列强占领非洲的时期, 许多因素也伴随着这种占领接踵而至: 新力量的渗透, 包括经济的、思想的和宗教的 (基督教) 力量。这一时期见证了伊斯兰教的加速扩张, 向此前从未接近过伊斯兰教的地区传播。也仅仅是在这一时期 (特别是在 1890—1930 年间), 伊斯兰教开始从非洲东部沿海向内地的班图人扩张。

尽管 19 世纪的军事伊斯兰时代, 在地域范围上属于传播最快的时期, 但是接下来的欧洲人统治时期, 在阻止了强迫皈依的同时, 伊斯兰教却以另外的方式加速扩展。在经年的战乱和捕奴运动之后, 和平的环境, 加之新型的交通设备, 使商人和宗教人士能够到达任何地区传播他们的宗教。并且, 上个世纪的穆斯林征服运动, 与接下来的西方文明的冲击, 都削弱了许多异教社会的宗教—社会结构。随着村民向城镇、种植园和矿区迁居, 新的生活方式也弱化了对长老的尊敬、传统习惯和社会道德, 所有这些都为像

① 直到殖民占领时期, 北部的各种组织形式下的许多集团仍未受影响。包括组织严密的莫西诸国, 从未被征服; 班巴拉人 (村庄国家结构); 苏丹南部地带原始部落。甚至苏丹北部地带, 也很少属于纯粹的穆斯林地区。

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文化的渗透开辟了道路，从而为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中心，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

在曾经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地区（尽管在法国统治区内的国家被推翻），伊斯兰教仍继续传播，原来所接受的伊斯兰教的核心内容仍未改变。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则见证了伊斯兰教的世俗化过程和新的伊斯兰社区的诞生。在这种新社区中，伊斯兰教的地位与西方国家中的基督宗教非常接近。这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教传播的过程，也伴随着西方文化的扩散。

这四个历史阶段，分别对应着四个不同程度或类型的非洲伊斯兰教：

1. 第一阶段在含米特人中扩张的伊斯兰教。形成两个文化地区（埃及和马格里布）。在这两个文化区中，伊斯兰教实现与社会生活的全面整合。

2. 传统的非洲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适应本土体制，获得不同程度的忠诚。宗教平行主义和宗教容忍是其特征；酋长们认可其人民对所有宗教的信仰和利用。

3. 基本的苏丹模式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法合并到社会生活方式之中。不宽容与平行主义同时存在。

4. 新伊斯兰社区中的世俗化伊斯兰教。西方的渗透伴随着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

二、不同伊斯兰文化区的形成

非洲伊斯兰教通过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偶然事件传播。我们还未在伊斯兰世界发现完全一样的模式。因为像斯瓦希里这样的新穆斯林社会的形成（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和正式的转变模式），或者业已存在的社会通过接受伊斯兰教而转型，都是通过进攻性的文化，如某些地方的伊斯兰教所代表的文化，与在非常不同的文化孕育下的人们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在伊斯兰文化与非洲文化的相遇中，形成吸引与排斥的两股力量；两股力量的碰撞中，两种文化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出现综合。一股力量走向分化，另一股走向同质化。这种相互作用催生了伊斯兰国家的诞生，直到西方世俗文化的到来。

地区间的多样性源自内部和外部差异性因素的推动：①地理的和民族的因素、前伊斯兰时期宗教与社会的基础；②外部的影响、历史上伊斯兰渗透的本质与区别。因此，东非伊斯兰教显示出受哈达拉毛的强烈影响，而西非伊斯兰教则显示出与马格里布伊斯

兰教联系的特点。

一方面，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沿着地区分界线形成文化区，另一方面，伊斯兰教也促进非洲文化的统一。伊斯兰教是一种强烈的文化影响因子，而且非洲社会一旦接受它，就会最终成为主导的力量。有些伊斯兰制度被普遍接受，并且不能将这些制度仅仅视作理解不同族群的纽带，它们还推动形成共同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于是，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全新的宗教—社会模式。

尽管地区间的差异清晰可见，伊斯兰教与非洲文化之间的对抗性的张力却是通过非洲伊斯兰文化的突出的统一性表达出来。虽然伊斯兰教正常地渗透到综合性的社会中（人为形成的集团，如斯瓦希里社会和奴隶村庄除外），并因而使其转型，而这些“受造型文化”中的伊斯兰因素却都是相同的。这是基于如下事实：伊斯兰教共有的制度塑造了非洲人的生活，残存的或者相似的非洲制度凝结在这些伊斯兰制度身上。这样的文化区域也因此被认为具有共同的伊斯兰遗产。

然而，由于非洲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综合并不彻底（因为伊斯兰教只是通过平行主义保持其独特性），通常以世界伊斯兰教的非洲表现形式，或者非洲文化的伊斯兰变体，来理解非洲伊斯兰教。

讨论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和历史作用，或者讨论伊斯兰制度最终形式的差异，我们需要将非洲分为不同的区域或伊斯兰文化区。这些区域并无绝对的评价标准，相同点比其差异性更重要。这种划分是一种有用的处理方式。非洲主要有三种伊斯兰文化区域：埃及、马格里布和黑非洲。每个区域，吸收伊斯兰教的程度不同，受伊斯兰教的塑造程度不同，原来文化的底色也不同。黑非洲地区间的差异，更多地取决于非洲文化基础的差异而不是伊斯兰教。这些文化区域包括：

埃及：近东伊斯兰文化和埃及尼罗河文化，体现在埃及村庄中的农业文化上。

马格里布：以柏柏地区为基础的北非地中海文化。

在中间撒哈拉—萨赫勒沙漠地区的过渡地带，摩尔人和图阿雷格人属于马格里布文化圈，特达人（Teda）则属于中苏丹文化圈。

西苏丹：黑人伊斯兰教。

中苏丹：黑人伊斯兰教。

东苏丹或尼罗河苏丹：含米特—黑人伊斯兰教。

东北含米特区域（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非洲之角的游牧人伊斯兰

教。

东非沿海区域：斯瓦希里伊斯兰教。

(一) 埃及和马格里布。前两个文化区，即埃及和马格里布，是伊斯兰教早期传播的地区，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将自己植入这两个地区以后的历史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这两个地区差异明显。这种差异源于它们基础文化（前伊斯兰文化）的非常不同。埃及自身形成了一个小天地，虽然它打破了文化隔离，并通过皈依一神教而经历深刻的文化转型，但是埃及却总能展示出鲜明的政治与社会特点。不过，以其伊斯兰的方向观之，埃及几乎毫无差异，彻底地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教。但是，地区间的差异却在民间（农民）文化上鲜明地体现出来。

北非其他地区，阿拉伯语称马格里布，尽管政治上并不统一，却构成另一个历史和文化实体。柏柏尔人给予这一地区独特性。今天，大多数柏柏尔人（超过三分之二）已阿拉伯化，剩下的则保留着他们的语言，主要在摩洛哥。马格里布伊斯兰教就是柏柏尔伊斯兰教——柏柏尔人吸收伊斯兰文化的结果，并且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教还存在于马格里布与黑人的西部非洲接壤的地区。本文无意追溯埃及和马格里布与非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仅是简单地区分这两个地区。

西非可分为三个伊斯兰文化区。第一，撒哈拉—萨赫勒地区，主要以摩尔人部落为特点。图阿雷格人也属于这一文化区，但特达人则属于中苏丹文化区。这里的伊斯兰教呈现出北非伊斯兰教中圣人崇拜的特点。除有限的程度（如穆里德教团）外，这一特点并未传给黑人伊斯兰教。同样，在北非的苏菲教团中，多功能的扎维亚与圣人崇拜密不可分，而这与黑人苏菲教团中对教团领导人的心理态度有所不同。另一个特点则源于游牧人，尤其是“战争部落”对宗教的漠不关心，于是形成了专业的“宗教部落”承担宗教功能，取而代之。这种类型的伊斯兰教影响了萨赫勒地区，包括像廷巴克图这样的城镇，也影响了黑人奴隶。

将伊斯兰教传到西非的虽然是北非居民和摩尔人，却是黑人给西非伊斯兰教打上自己清晰的烙印。撒哈拉—萨赫勒地区属于北非伊斯兰文化的范围，而苏丹伊斯兰教则展示出鲜明的非洲特色。

可将苏丹伊斯兰教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区域：西苏丹、中苏丹、东苏丹或尼罗河苏丹。西苏丹与中苏丹区域的差别很难感觉到，可以说属于统一的西非伊斯兰文化区。东苏丹文化则截然不同。我们通过直接的接触，来认知西苏丹和中苏丹伊斯兰教的差别，

这是一种直觉的洞察，但是却难以用鲜明的模式来表达出我们的这种感受。

(二) 西苏丹。图科洛人和索宁克人是首先皈依伊斯兰教的苏丹居民，并在伊斯兰教身上留下了他们的烙印。在某些方面，西苏丹的宗教人士比中苏丹的宗教人士对伊斯兰教的影响更深，尽管后者更强调遵守伊斯兰教法。如果比较一下他们各自对刚刚伊斯兰化地区的作用，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比较一下图科洛人和曼德人的宗教人士对几内亚西部异教徒的作用，与豪萨人的宗教人士对加纳、多哥、达荷美和尼日利亚北部异教徒的作用，就比较清楚了。图科洛人和索宁克人主要受北非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形成了鲜明的伊斯兰意识和教法形式。现在，伊斯兰教的传播者主要是图科洛人、索宁克人及其他曼德人宗教教师和商人。

西苏丹伊斯兰教与其母文化和中苏丹伊斯兰教的区别，包括家庭喜庆的方式（如，在第八天的仪式上——同时念经名、宰牲、刮脸，在几内亚还要杵谷子），这种仪式更强调以白米饭（或其他大宗食物）“献牺”，而不强调宰牲。神灵信仰的实践也明显遵循曼德人的模式。他们相信死后“过河”的仪式，并称等待离去灵魂归来的地方为“阿拉弗”（arafo）。这一地区有自己独特的伊斯兰传说。基本的国家结构也就是村庄结构。

(三) 中苏丹。中苏丹在尼日尔以东，这里受来自尼罗河谷（包括埃及和尼罗河苏丹），以及中马格里布伊斯兰教的影响。这一过渡地带大致位于实行职业世袭等级制度的西苏丹和实行特有阶级制度的卡努里—豪萨地区之间，其国家制度中有多种等级和官阶名号。社会的流动性，使中苏丹的未能发展任何严格的世袭等级制度。加奈姆和卡努里的居民首先皈依伊斯兰教，并给乍得伊斯兰教打上鲜明的印记，尽管他们从来都不是活跃的宣教者，只是将伊斯兰教看做城市和贵族的信仰崇拜，同时也看做是特别职业化的信仰崇拜。尼日尔中部的桑海人，虽然与卡努里人很是不同，却同属于中苏丹伊斯兰范围，而不是过渡地带，主要原因在于其古代黑人传统基础的坚实和有组织的附身神灵崇拜（possessive-spirit cult）的类型。附身神灵崇拜虽然已不再是民间信仰，也为体制化的伊斯兰政权所不允，却仍顽强地在社会中流行。在西苏丹，丈夫要送给妻子嫁妆，中苏丹则是妻子送给丈夫。中苏丹的城市国家拥有等级复杂的官僚，这与在神权国家建立之前的曼德人村庄国家组织形成鲜明对比。在豪萨，建立神权政治的尝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种贵族政治国家结构的强大，裹挟了穆斯林宗教改革者，将伊斯兰的宗教等级制度吸纳了进去。西苏丹则相反，改革者们没人真正地采纳原来的组织形式，而是明确地以伊斯兰信条为基础，建立了新型的国家。



(四) 西非其他伊斯兰地区。其他地区，包括几内亚西部、苏丹南部地带、沃尔特地区、几内亚南部，直到 19 世纪才处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伊斯兰教在几内亚西部传播很快，这里的伊斯兰教主要源于富塔贾隆。沃尔特地区的居民基本上仍未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在苏丹南部地带，许多酋长（如尼日利亚中部）已接受伊斯兰教，但是部落中的普通居民则受伊斯兰教影响相对较小。在几内亚南部，伊斯兰教只在约鲁巴人中取得重大的进展。这些地区中，出现伊斯兰教的渗透与西方文化推进同时进行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伊斯兰教。古老传统、伊斯兰教与西方世俗生活态度的相互作用，正在形成一种更为世俗的宗教态度和生活观念。

(五) 东苏丹或尼罗河苏丹。就伊斯兰教而言，含米特地区东部是其基地，包括河谷地带的努比亚人、雨林地区的农民（含米特黑人）、游牧人（贝沙族）。这一地区位于尼罗河谷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含米特人、黑人和非洲阿拉伯人交流的地区。因为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一起扩散，尼罗河苏丹像马格里布一样，在文化上既是近东的一部分，也是非洲的一部分。而苏丹地带的其他地区（毛里塔尼亚被认为在文化上属于马格里布）则不然。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是因为阿拉伯人而不是伊斯兰教。与其北面的埃及相比，伊斯兰教对这里的渗透较晚，始于 14 世纪初期阿拉伯人的扩散。在伊斯兰教早期的几个世纪中，阿拉伯人并未有意识地在这里宣教，当然表面的伊斯兰化也在随着阿拉伯化同时进行。阿拉伯语成为当地人使用的通用语，取代了当地定居农民的语言（尽管未取代最北部的努比亚人和游牧的贝沙族的语言）。但是，伊斯兰教通过阿拉伯化的努比亚人的努力，成为当地人的信仰。阿拉伯化的努比亚人也因此构成了当地的宗教阶层。

努比亚人大规模地皈依伊斯兰教，主要发生在 1300 至 1320 年间。不断向南推进的伊斯兰化同时伴随着阿拉伯化。来自上埃及的阿拉伯游牧人分布到努比亚各地，他们主要推动了操含米特语的族群〔如，沙伊奇亚（Sha'iqiyya）部落和贾里因（Ja'liyyin）部落〕的阿拉伯化。但是，含米特语族群真正全身心地皈依伊斯兰教却是当地的宗教阶层成长起来以后的事。正是这些当地的宗教学者逐一“点燃了”这些尼罗河边居民的“阿卜杜·卡迪尔之火”^①，特别是在努比亚人中，如马哈斯人（Mahas）。这些努比亚部落大规模向南迁移，并于 16 世纪阿拉伯化。由此便奠定了尼罗河苏丹伊斯兰教的格局。

① 即加入卡迪里苏菲教团。——译者著。

尼罗河苏丹伊斯兰教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教法学与神秘主义的完美融合，即神秘主义对教法的调和。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尼日利亚北部穆斯林领袖那种特有的僵化和刻板（也找不到平行主义）。宗教人士既是教法学家，同时也是苏菲主义者。虽然这一地区与埃及和希贾兹的联系——主要的外部联系——导致一些宗教导师〔如，阿巴吉地区（Arbaji）的杜山（Dushain）〕接受了沙斐仪派教法，但马立克教法学派在这里仍占主导地位。民间宗教以苏菲主义为基础，这种苏菲主义是以个人或家庭的“集体苏菲道路”（*tariqa-ta'ifas*）为中介的形式存在，与圣人崇拜密不可分。我们也许会注意到这种圣人崇拜以“阿拉伯化的含米特人”为特色——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我只能这么说——这与马格里布、毛里塔尼亚、东苏丹是一样的情况，却与黑人伊斯兰世界迥然异趣。^①

（六）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地区，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即东部非洲之角平原地区居民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此地是一片差异巨大的地区，这些差异不只是地理上的，还有族群的多样性、文明程度、语言、宗教等诸方面的差异。这一地区的命运曾经与红海，而不是与尼罗河谷密不可分，并且，这一地区正是从阿拉伯半岛传入了闪族语言和文化，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

从受伊斯兰教影响的视角来看，可以将这一地区划分为三个次级区域。1. 游牧的阿法尔人（即阿拉伯人所称的达纳基尔人）和索马里人所生活的平原地区。此地居民全部为穆斯林。历史上，这一地区与跨越红海的移民和商业潮流相联系。2. 北部和中部的高原地区。这里是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所在地，具有根深蒂固的外来的而不属于非洲的传统。正是这一区，在历史上遏制住了穆斯林部落或者穆斯林国家扩张的步伐，并维持了宗教的统一，因此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也成为该地区唯一的统一体。而高原北部的盖拉族〔包括也吉（Yeju）、拉雅（Raya）、瓦数（Wallo）〕，则全部为穆斯林。3. 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在这一地区，伊斯兰教成功地叠加在当地的西达马人（Sidama）和马查盖拉部落（Macha Galla）的异教信仰之上。

① 在黑非洲伊斯兰教中，圣人崇拜、奇迹观念并不强烈，这可能是基于如下的事实：奇迹观念与一种历史的、静态的宇宙观相联系，而与黑人的动态的宇宙观并不对应。祖先崇拜与祖先的陵墓也无密切联系。宗教教团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黑非洲，更多的情况下苏菲教团只是贴上伊斯兰教的标签，它在这里的作用有所降低，这一现象似乎与如下事实有关：圣人崇拜并不伴随着它们的传播。而在尼罗河苏丹，圣人崇拜与教团的扩张是统一的。

(七) 斯瓦希里地区

伊斯兰教通过红海和印度洋渗透到东部非洲。在红海沿岸游牧的含米特人，以及前面提到的东非之角的诸区域居民，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索马里以南的内陆地区，直到 19 世纪才开始遭遇伊斯兰教的渗透，并且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播主要只是个人的零星皈依。一方面，伊斯兰教将苏丹地带的居民全部收入囊中，并对这里的非洲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却对东非的班图人及其他部族影响甚微。海外移民在这里建立居民点，形成了封闭的社区。这种独立的沿海居民点无助于伊斯兰教在班图人和游牧人之间的传播，仅仅导致了一个新民族的形成，即斯瓦希里人。斯瓦希里人操独特的伊斯兰—班图的混合语，属于伊斯兰文化和班图文化的亚文化，其居住范围从拉穆延伸到莫桑比克地区。斯瓦希里人并非一个同质化的人群。他们由多个亚族群组成：设拉子人（主要居住在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包括沿海地区一些家族的残余^①）、非洲—阿拉伯混血族群（在人种上与非洲人显著不同）、奴隶的后裔、脱离内地部落而到沿海定居的劳动者。他们是不同的社会阶层的混合体，同时又是一个分层明显的社会和文化集团，遵循着伊斯兰的生活方式。在形铸斯瓦希里文化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影响来自哈达拉毛（如，沙法仪派教法）。这种影响不仅明显地存在于宗教仪式与教法中，还存在于其他一些重要的仪式中，以及迷信活动中。

直到 19 世纪末，伊斯兰教才向内陆传播。伊斯兰教迅速传到坦噶尼喀湖地区，特别是在尧族（Yao）中和湖边的部落中，传播较快。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里的伊斯兰教的许多内容来自沿海的斯瓦希里伊斯兰教，但是中世纪特有的对宗教的态度并未在内陆建立起来，这里的伊斯兰教仍然具有外来宗教的特色。穆斯林组成独立的社区，伊斯兰教虽然在当地的事务中占有位置，但对这些事务的影响并不大。坦噶尼喀伊斯兰教最明显的地方元素，是被称为柬杜（Jando）的割礼仪式，这是内陆伊斯兰教特有的入教仪式。至于圣人崇拜和苏菲教团，仅限于沿海地区及其岛屿上。

伊斯兰教对中非和南非的渗透非常弱，甚至可以忽略。在原来“法国赤道非洲”（乍得地区和喀麦隆北部地区除外，它们属于苏丹地带）和刚果，穆斯林人口微乎其微；在南非，穆斯林集团也仅限于某些部族，如马来裔的有色人群中。

① 主要指波斯设拉子地区移民家族的后裔——译者注。

have rich folk culture. The article is to focus on four life etiquette—birth etiquette, growing etiquette, marriage etiquette, and funeral etiquette, which shows the metropolis character of Xian Huis' folk culture. It is influenced greatly by multicultural factors, and affected by historical culture of an ancient capital as well. This distinctly displays the ethnic and regional character of Xi'an Huis folk culture.

Journey of Faith and Journey of Integration: the Difficulty Choice by French Muslims.

..... By Zhu Jianhong Wang Jianping(190)

Through the analysis to the social problems existed among the Muslim groups in France, this paper probes the reason of the identity conception change for French Muslims, and explains the possibility and future perspective in parallel of the journey of the faith with journey of the integration. It also has constructed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feasible model for French government in carrying out its "Republic integration". It holds that a truly peaceful cultural exchange and real integration can be realized if French society euphemizes the Muslim immigrants to obey the republic system, meanwhile it should respect their faith, and demolish the existent barriers between Muslim immigrants and the French citizens.

An investigation of changes of the concept 'modernization' in Egyptian society

..... By Lian Chaoqun(200)

Arabic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conducted by Arabic language academies and going through both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phases, is an indelible part of the double processes of modern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in Arab-Islamic societ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arrative of the Cairo Academy about its institutional origin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1930s and 1980s. Using histor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traces changes of this narrativ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hase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onceptual change of modernization in 20th-century Egyptian society.

The Spread of Islam in Africa and the Islamic Cultural Beltst Translated by Li Weijian(211)

There were four stages of the spread of Islam in Africa and as a result of different cultural area came into being in this continent. The article revalated the detailed steps of each four stages and different cultural areas which was the resulted from different way of the spread.

The Rigion of Kūhistān By Han Zhongyi Zhu Liang Zhong Wenjia(221)

A region called Tunocain by Marco Polo. Kāyin andTūn Turshiz and the Pusht district; the Great Cypress of Zoroaster. Zāvah. Būzjān and the Zam district. Bākharz district and Mālin Khwāf. Zīrkūh. Dasht-i-Biyād. Gunābād and Bajistān Tabas of dates. Khawst, or Khusf. Birjand and Mūminūbād. Tabas Masīnān and Duruh.

